

程端学及其《春秋本义》

吴志坚

2008年,浙江图书馆所藏《春秋本义》元刊本残本被列入全国首批珍贵古籍名录中。此书作者程端学在浙江地域文化史上颇为重要,在中国经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人其书,值得后人重视。本文考订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学成就,并对《春秋本义》版本情况略作考辨。不当之处,请读者方家指正。

一、程端学生平

程端学,字时叔,号积斋,庆元(今宁波)人,元至元十五年(1278)出生。四明程氏迁鄞始祖讳珍,在唐代从鄞阳(今江西波阳)迁至庆元鄞县。其孙某仕“太子左卫率府胄曹参军”^①,杜甫有一首诗《送率府程录事还乡》^②就是为他所写。历五代至宋,程氏世居鄞县,“代有闻人”^③。至南宋,曾祖振父,任平江府百万仓司门;祖在孙,知平江府常熟县事;父程立在宋末为乡贡进士,相当于明清两代的举人,尚未取得入仕资格,南宋就灭亡了。

庆元在南宋密迩京师,科第鼎盛,仕宦大族林立,如史氏、袁氏、黄氏等,人物极盛。相比之下,程氏只能算二、三流家族。入元之后,庆元地区科举门第兴盛的局面骤然消歇,整个元代只出了四位进士,其中有两位是色目人;而程端学是剩下的两位南人进士中的一位^④。对于同时代人来说,程端学以科举上的成功引人瞩目。他在至治三年癸亥(1323)参加江浙行省乡试,所作《四灵赋》,因为不合科举标准差点被黜落,幸亏考官欧阳玄独具慧眼才得以挽回。这段佳话在元代广为流传,一直到明代还被载入笔记中^⑤。程端学参加会试和殿试表现也很突出。会试所作《春秋》经义,考官叹为非有三十年功力不成;而殿

①(元)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三《程端礼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99年。

③(元)欧阳玄:《积斋程君端学墓志铭》,(明)程敏政纂,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黄山书社,2004年。

④(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送照上人东归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明)曹安:《谏言长语》不分卷,中华书局,1991年。

试对策尤为特出,本来被取为左榜第一,因格于南人不得为状元的惯例,而屈居第二。就是因为二甲第一的名次,程端学成进士后初调仙居县丞,没有上任,就改授国子助教。任满授翰林院编修,三年后回鄞县乡居一段时间,被外放为筠州经历,两年后,朝廷以太常博士见召,但他没有赴任就去世了,卒年虚龄五十九,这是元统二年(1334)的事。

程端学四十五岁方才应试,入仕后宦情甚薄,一生主要精力放在《春秋》经的研究、著述上。他的乡试座主、后来的国子监同僚欧阳玄回忆起程端学在教学之余,一有空闲,就和他讨论《春秋》经,所有的心力都集中在《春秋本义》的著述上,“朝夕删改不已,寝食为废”,以至于损害健康,“癯瘁多病”^①。程端学寿命不长,显然与他在学术上过于投入,积劳成疾有关。

关于程端学的身后,元末的人们还艳羡他有一位官至兵部尚书的儿子程徐。元亡后程徐与危素一道降明,而他的夫人金氏在大都城破之际投井自杀,宋濂《元史》把她列入《烈女传》,并借金氏之口说程徐在“捍城”^②;《明史》又借相者之口讽刺他“冷笑无情,非忠节相”^③。这些都是历史作家皮里阳秋的手法,也是程端学身后历史不被人注意的背阴的一面。

程端学在《元史》中有传,附见于《韩性传》,仅寥寥数十字,是欧阳玄《程端学墓志铭》的缩写。欧阳玄撰写的墓志铭是关于程端学生平最重要最详细的材料。这篇墓志铭未收入欧阳玄的别集《圭斋集》中,而见于《新安文献志》。此外,黄潛所撰《程端礼墓志铭》^④对考订程端学的家世生平也有重要参考作用。根据这两篇墓志铭,我们不仅可以勾勒出程端学的家世生平,还可以订正《元史》中关于程端学参加科举时间的讹误^⑤。不过《程端学墓志铭》也并非全部内容准确无误。它将《春秋本义》引用书目一百七十六家误作一百三十家,这个小小的疏忽又被《千顷堂书目》、《宁波府志》等沿袭^⑥。

四库馆臣显然并没有注意到欧阳玄写的这篇墓志铭。因此在《〈春秋本义〉提要》中,一方面沿袭《元史》,将程端学成进士时间误作“至治癸酉”,另一方面指出《千顷堂书目》等书关于《春秋本义》引书家数的错误,而不知这个错误的源头是《程端学墓志铭》^⑦。

①(元)欧阳玄:《积斋程君端学墓志铭》。

②(明)宋濂等:《元史》卷二百〇一《烈女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

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九《袁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④(元)黄潛:《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⑤《元史》卷一百九十《程端学传》云程端学“登至治辛酉(1321)进士第”,误。欧阳玄《程端学墓志铭》记其登泰定元年甲子(1324)第。

⑥(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⑦(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

二、程端学《春秋》学成就

程端学真正的历史作用在于,他与兄长程端礼一起,改变了元代庆元地区的学术面貌。南宋末年乾、淳年间,朱、陆之学并列,并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四明学者多宗陆学,庆元成为陆学的传统阵地。《宋元学案》专门为列“慈湖学案”。只有黄震、史蒙卿宗朱子理学,是少数派。程端礼、程端学兄弟师承史蒙卿,“尽得朱子明体达用之指,……平居一举动必合礼法,时人以其方严刚正,以‘二程’目之”^①。这“二程”在家乡创办甬东书屋,影响很大。加上长期教学和著作,几十年间,影响被于全国。四明地区学风也随之改变,原先为少数派的朱子理学成为主流,而陆学则成为伏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王阳明心学兴起之后。这是浙东学术史上重要的一环。程氏兄弟的这个贡献,黄潜和欧阳玄都特为表而出之。

当然,“二程”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元代将程朱理学定为标准的科举政策。不过程、朱(主要是朱熹)在经学领域的主要成就是整理和注释四书,至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五经,只留下程颐《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诗集传》,其五经解释体系并未完成。加上元代还规定五经可以兼用唐宋古注疏^②。所以,所谓元代科举“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因此,对于元代学者来说,当务之急是根据朱子的经学见解,完善适于科举的经学注释体系。这种努力有两个方向,一是在朱子基础上,继续完善经学体系,重在学术性;二是固守朱子章句,并将其简易化,以适于举子应试的实际需求。

程端学的《春秋》研究以第一个方向为主,而兼有为科举应试提供标准的意图。朱熹是宋代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者,其治经,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探求经文本义的客观主义原则;一是最终主旨归于天理的原则。他虽然没有专门去注《春秋》,但有许多关于《春秋》的重要见解,他认为“《春秋》皆乱世之事,而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③。所以他一方面批评《左传》只知功利,不知义理,是史家风格而不是经学;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春秋》“义理”并非通过一字半字的褒贬来体现,传统所谓褒贬义例都是附会穿凿,并非孔子本旨;孔子只是“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④。

程端学的《春秋本义》完全按照朱子纲领。他在《春秋本义》的《通论》部分系统阐发了反对褒贬义例,主张属辞比事以探求义理的主旨。此书体例“仿

①(元)欧阳玄:《积斋程君端学墓志铭》。

②《元史》卷八十一《科目》。

③(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中华书局,1986年。

④(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

朱子《集注》之意,先训诂,而后事实,而后议论。议论即本义也”^①。可见全书重点在“议论”,即探求义理,而兼顾训诂和事实。诸家之说中,凡程端学认为合于经旨者,就附于经文之后,有时“间附己意于其末”,而以“愚谓”二字标出^②。本书正文前有“春秋传名氏”、“春秋纲领”、“春秋通论”和“春秋问答”,内容分别是引用书目、前贤论《春秋》主旨、全书凡例和重点问答。其中“春秋纲领”引用前贤重要的说法,在当时是这一类书的通例,胡安国、张洽等《春秋》传也是如此。引用书目和全书凡例自然也必不可少。只有“春秋问答”,采用经问的形式,带有国子监授经的特色,而使全书体例稍显驳杂。但总体而言,还没有到四库馆臣所说“体例颇为糅杂”的程度^③。

四库总目提要对《春秋本义》基本持否定态度。主要原因是程端学尽弃汉代三传之学,“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献》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于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④。对此,四库馆臣评论道:“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记录最真;公羊、穀梁去圣人未远,见闻较近。必斥其一无可信,世宁复有可信之书?”宋人主体意识张扬,治经“摆落汉唐,独研义理”,而清人责以不信古书,这就显示出宋学与清代朴学之间立场的巨大差异。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三言两语判定此优彼劣的范围。不过四库馆臣对程端学的批判,倒揭示出程端学作为宋代《春秋》学总结者的地位。

《春秋本义》总结性的一个外部表徵是徵引文献极其丰富,达一百七十餘家之多,凡前代,尤其宋代治《春秋》诸家,几乎囊括殆尽。这些经学家著作“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⑤。朱彝尊《经义考》论及宋代《春秋》经学时,频繁引用《春秋本义》,体现出这部书重大的文献价值。

与《春秋本义》相辅而行,程端学还撰《三传辨疑》、《春秋或问》,内容分别为“订三传之疑”,“校诸儒之异同”。据作者《春秋本义》自序,这三部著作耗费了二十多年,凝结了程端学一辈子的心血。

三、《春秋本义》版本

《春秋本义》主要有三种版本:元刊本、《通志堂经解》本和《四库全书》本(取较为易得的文渊阁本),皆为三十卷。

元刊本残本今存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浙江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四处。四个藏本行款、板式一致:22×15cm,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双鱼尾,细

①(元)程端学:《春秋本义》卷首《春秋本义通论》,通志堂经解本。

②(元)程端学:《春秋本义》卷首《春秋本义序》。

③(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春秋本义〉提要》。

④(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春秋三传辨疑〉提要》。

⑤(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春秋本义〉提要》。

黑口,版心阔大。版心左上角刻有本版字数。右下角刻有刻工姓或名,或一字,或二字,部分用阴文刻于下鱼尾中。这几个藏本应该为同一版本。其中天一阁藏本十卷,分别是卷十三至十八,卷二十五至三十,两册,纸捻装;浙江图书馆存六卷,分别为卷十六、十七,卷二十七至三十,三册,线装。天一阁藏本字迹清晰,浙江图书馆藏本部分版面字迹模糊。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天一阁藏本为初印本,而浙江图书馆藏本后印。

几个残本都缺卷首、序等内容,但从刻工看,其中有叔辛、叔璋、君用等,均为元代至元年间杭州、宁波著名刻工,曾刻过《玉海》等书。根据刻工的时代和地域,可以基本断定这个元刊本就是元至正庆元官刻本。

关于这个元刊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元刻有句读圈点,甚精。”^①这句话容易引起误解。从今存的元刊本看,“句读圈点”并非刻本原有,这里讲的“句读圈点”大概是邵懿辰所见之本特有的,当为此书的使用者阅读使用时所加。

天一阁还藏有一个明代甬东书屋抄本,存卷数、内容和一些异体字的写法与其所藏元刊本残本完全相同,显然就是这个元刊本的抄本。这说明天一阁藏本形成残本的时间较早,可能一开始就是残本。因为底本尚存,这个抄本没有校勘价值。

由于今存元刊本皆为残本,卷首内容不存,导致许多关键刊刻信息缺失。不过,这些卷首内容却完整地保留在通志堂本中。通志堂本《春秋本义》卷首原封不动照搬至正三年浙东道廉访司责令庆元路刊刻此书的公文,以及张天佑、程端礼序,程端学自序等三篇序文,其中张天佑是庆元路刊刻《春秋本义》实际负责人。他在序中详细记载了庆元路学刊刻此书的过程。对确定元刊本的刊刻情况至为关键。全文如下:

四明时叔程先生以《春秋》一经诸儒议论不一,未有能尽合圣人作经之初意,于是本程朱之论,殫平生心力,辑诸说之合经旨者,为《本义》以发之;订三传之不合于经者,为《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诸家之说者,作《或问》以明之。书成,而先生卒。翰苑诸公欲进于朝,由是移文浙东宪司,俾钁梓以传远。遂牒本道帅府,于概管七路儒学出帑以助之。至正三年夏五月命工,因循未克就。五年冬十一月,金宪索公士岩巡历至郡,久知是书能折衷诸说,辨析精详,深得圣人之旨,不可缓也,委自监郡与天佑提督刊梓。愚不敏,仰承所托,朝夕视事,不一月而工毕。实是年之十二月甲子也。天佑备员府幕,与先生之兄敬叔父交且久,今又获见此书之成,故乐而道之也。然此特记其岁月云尔,若夫此书之发挥圣经,嘉惠后学,则亦不待赘述。

①(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三《春秋总义》。

这则序非常重要,所以被朱彝尊收入《经义考》中^①。根据这则序文,我们可以确定:元刊本《春秋本义》,连同程端学另外两部《春秋》著作,《三传辨疑》、《春秋或问》,始刻时间为至正三年五月,到至正五年十二月刻成;刊刻地为宁波;刊刻者为浙东帅府。其刊刻过程与元代诸多官刻本一样,由中央相关部分责成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落实到地方儒学出资刊刻。这些版本信息,是我们可以补入相关著录内容的。

浙东廉访司公文和张天佑序是庆元路官刻本原有的,出现在通志堂本中,说明通志堂所用底本就是这个至正庆元官刻本。

《通志堂经解》由徐乾学主持,底本采择较佳,刻印也颇为精良,是较佳而易得的善本。从《春秋本义》看,通志堂本的校勘同样精审,与底本相比,可以说出于蓝而胜于蓝。此举数例:

通志堂本卷十七,叶六B,行二:“晋楚争欲服郑”,元刊本“服”作“复”,作“服”于义为长;卷十七,叶十五B,行十“六月癸卯”,元刊本脱“癸卯”二字;卷二十七,叶五B,行十“二月辛卯”,元刊本误作“一月”;卷二十七,叶九A,行十“有事于鲜虞凡几役矣”,“几”元刊本误作“畿”;卷二十八,叶三B,行七“杜氏曰”,元刻本误作“左氏曰”。

元刊本最为严重的问题在卷十七,通志堂同卷叶十七B行三“前说近是”之“近”,至叶十八B,行三“古者十一而籍”之“者”,其间三百餘字,整一板内容在元刊本中全部脱落。这里的脱落不是装订中的漏叶问题,而是版本的问题,因为元刊本虽然内容漏掉一版,版心页码却相连。

凡通志堂本与元刊本相异处往往是前者对而后者错,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卷二十五,通志堂本叶九A,“我请弑之”,元刊本“弑”作“试”,相同内容他书皆作“试”,“试”是对的;又卷二十八,通志堂本叶十二A,“十有三年春”,误,当作“十有二年”,元刊本不误。不过这种情况颇为罕见。这些情况说明,通志堂本在刊刻时,进行过仔细的校勘。事实上,其每卷卷末最末一行都有“后学成德校订”字样,即通志堂主人纳兰成德,纳兰成德是否真的亲临其事值得怀疑,但既然列名其后,校订自然较为审慎。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目前最普及易得的一个本子。该本著录为“两江总督采进本”,并照例删去卷首部分序言,只保留了程端学自序。不过它的底本应当就是通志堂本。通志堂本是四库馆臣参考的重要版本,凡四库本与之不同,必表而出之,并说明理由,但采用通志堂本者,则一般不作说明。四库本没有提及通志堂本,但其卷十七内容与通志堂本一样完整而无遗漏,上所举通志堂两处错误也为四库本沿袭。这说明它的底本不是元刊本或其他本子,而只能是通志堂本。

四库本《春秋》经以任意删改内容而享有恶名。《春秋本义》当然也不例

^①(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五,《四部备要》本。

外。不过除了这个毛病外,四库本也有可取之处。它改正了通志堂本的许多错误。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卷五,通志堂本叶十三A,“御廩之灾,在致灾三日之前”,元刊本同。此句不通。“致灾”,四库本作“致斋”,是。卷二十二,通志堂本叶二十二B,“乃伐之殿”,四库本“伐”作“代”;卷二十三,通志堂本叶七A,“敬似”,四库本作“敬姒”。这样的例子有不少,说明四库本对通志堂本的讹误也有所更正。

因此,就版本源流而言,《春秋本义》的这三个版本关系很简单:元刊本是祖本,通志堂本据元刊本校订,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是根据通志堂本删改并校订的。

程端学《春秋本义》版本源流关系简单,说明此书流传颇为稀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盛行而版本众多的情形。其原因很简单:程端学《春秋》著作虽然也有科举用书的作用,但主要是按照朱子观点对宋代《春秋》学进行学术总结,重在学术性;而《胡氏春秋传》在元代被定为科举标准用书,至明代永乐年间又被采入《五经大全》,科举权威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凡圣经为《春秋》的举子无不诵习。此热彼冷,不言而喻。入清以后,乾嘉朴学兴起,学者不好宋学,如四库馆臣虽号称于汉学、宋学无所偏向,但实际贬抑宋学倾向十分明显。加上《春秋本义》所体现宋人对夷夏之辨的强烈意识在清代不仅不合时宜,且大犯时忌。所以,程端学的《春秋》著作在清代继续遭到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遭到后世冷落,但在经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这就是程端学及其《春秋本义》。今各馆所藏元刊本虽非全帙,却是此书几种版本的祖本,因此弥足珍贵。最近,此书被列入中国珍贵古籍名录。但愿它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能够被学界更好地利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